

# 清末民初天津妈祖信仰中的两种逻辑

孙 跃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0)

**[摘要]** 本文以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的研究框架考察了清末民初流行于天津地区的妈祖信仰。其中, 政治逻辑主要体现在统治者的神道设教上, 而生活逻辑则体现在民众对妈祖有求必应的愿望以及对妈祖信仰的利用之上。两种逻辑的提出可以作为一种观察视角或观察方法, 以此去考察一个特定的神祇信仰, 从而重新认识信仰背后的运行逻辑。

**[关键词]** 妈祖信仰; 政治逻辑; 生活逻辑; 神道设教; 有求必应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5-0115-07

## 一、研究框架的提出

不可否认, 妈祖、碧霞元君和观音已经成为中国民众中最有影响的三大女神。妈祖信仰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崇拜发展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官方崇拜的过程同样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詹姆斯·沃森对妈祖信仰的考察是其中最具影响的研究之一。他提出的神灵的“标准化”的分析框架对此后的民间信仰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沃森不仅考察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妈祖信仰理解的多样性, 而且更对文化的一致性表现出相当的关注。他在文章结尾部分提出中国政府对文化整合的聪明做法是“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内容”, “鼓励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这一点极具启发性。另一方面, 在他对妈祖“标准化”过程的考察中, 地方精英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他们对于国家崇拜的支持使得“标准化”的过程更容易。在沃森看来, 由于支持国家允准的神灵对于地方精英有利, 因此地方精英在这一过程中与国家进行了合作。尽管不同群体对于妈祖的理解不尽相同, 但这并不妨碍官方所提倡的表面的一致性。<sup>[1]</sup>

在沃森的研究中, 他将朝廷、地方精英、农民、船民和妇女等群体看作是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实体, 并且彼此之间的利益各不相同。因此妈祖作为一个象征体现出这些群体的利益交集。换句话说, 沃森更加关注由象征贯穿其中的利益、权力与差

异。这种研究视角在海外学者的民间信仰研究中十分常见, 例如杜赞奇在对 20 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的研究中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框架分析地方社会中各种力量借用象征符号与规范体系相互竞争, 以获得一定的权威、合法性与利益的过程。相比于“文化网络”来说, 杜氏似乎更加关注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诉求。而在获得权威与利益的过程中, “文化网络”只是实现各种目的的工具。杜氏将“文化网络”中的象征符号与价值规范仅仅当做乡村精英与国家获得权威与合法性的工具, 因此在他眼中, “文化网络”只是一种利益争夺的资源。在他的分析中, 只看到权力、利益、竞争, 却看不到象征符号与价值规范对个体与群体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抽离了价值的权力斗争无疑受到了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西方学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于中国大陆的民间信仰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庸讳言, 我们对官方信仰或者民间信仰的研究不仅仅考察的是信仰内容本身, 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信仰行为背后所蕴含的运行逻辑。对于一部分该领域中的西方学者来讲, 这种运行逻辑无疑会归结到通过权力与权威的占有与使用而实现各自的利益。西方学者的这种“权力观”能否适用到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研究还是一个疑问。<sup>①</sup>因此, 本文将提出一个不同的分析概念, 即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 去考察一个特定的神祇信仰, 从而重新认识信仰背后的运行逻辑。

**[收稿日期]** 2013-02-20

**[作者简介]** 孙跃(1983-), 男, 天津人, 讲师, 社会学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思想史。

所谓生活逻辑,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观念、态度、价值、习俗、信仰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活法”。它以日常生活为范围,处理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且通常是当事人习以为常的、较少意识到的以“天经地义”的形式被接受下来的,主要以初级群体进行传递的一套法则或规

律。而政治逻辑是指,以制度、政策与意识形态等形式表现并传递的,通过权力与权威的占有,旨在维持既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清除威胁或者潜在威胁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因素的一套被当事人充分意识到的理性设计。关于二者的比较如表 1:

表 1 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比较

Tab. 1 Comparison between Living Logic and Political Logic

	表现形式	涉及范围	目标	主体	是否意识到	传递方式
生活逻辑	习俗、信仰、态度、观念	日常生活	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各阶层的人们	否	初级群体
政治逻辑	制度、政策、意识形态	统治范围	维持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统治者	是	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区分与“大传统”和“小传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二者所处理的问题是处在两个不同层次的场域之中的。由于生活逻辑是人们面对日常生活的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行为倾向,因此它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之中,包括统治者。我们可以想象,对于乡村中的村民和皇宫中的皇帝来说,他们每天所面对的日常生活尽管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是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要处理生老病死、人际关系、吃饭穿衣、娱乐休闲等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此时的皇帝与普通的百姓没有本质区别,同样遵循着生活逻辑行事。而政治逻辑处理的是另外一个场域的事情,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它是当权者所要考虑的针对整个统治范围涉及统治秩序的理性思考。因此政治逻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陌生的、神秘的和遥远的。对于处在社会上层的统治者而言,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有时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会使当事人产生心里紧张,其结果或者“以大局为重”服从政治逻辑,或者“儿女情长”服从生活逻辑。

妈祖信仰列入国家祀典,赋予了妈祖信仰以合法的身份,从而使得各地以官方名义建立的妈祖庙或天后宫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对于历代的朝廷来说,为妈祖建庙以及封爵,既通过象征符号向世人昭示着皇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为祭祀妈祖的道德规范与行为规范划定了界限。可以想见,那些不遵守祭祀礼仪的或者有悖于道德规范的祭祀行为通常被称为“淫祀”。这样,成为官方宗教的妈祖信仰便向人们展示了官方所倡导的社会规范。

在关于妈祖的众多传说中,有一个传说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据说在妈祖还没有成为神之前,她有四个哥哥。四人都是商人,大概从事海岛之间的贸易运输之事。一天,四位兄长出海,而妈祖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则在家中织布。突然,妈祖像失去所有知觉一样倒在织布机上,而妈祖的父母则被女儿的样子吓坏了,不停的呼喊女儿的名字。少顷,妈祖醒来,后悔地说道,为何不等我保护完兄长们安然无恙呢?后来,兄弟三人哭着回到家中,向父母述说他们如何遇上海难,如何被一神奇的女子相救,大哥如何被海浪吞噬的过程。这时,妈祖的父母才知道当时女儿正在出元神救助海上遇难的兄长,而正是由于自己大声疾呼女儿的名字,使女儿分了心,无暇救助大哥,致使大哥沉入海底。妈祖的父母遂悲痛万分,懊悔不已。<sup>②</sup>在这一个传说中,妈祖救助自己兄长的事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其他关于她是女巫的传说不同的是,这个故事中的妈祖的神力体现在了家庭内的道德中了。

## 二、神道设教:

### 政治逻辑的体现形式之一

自宋代以来,历朝历代的朝廷对妈祖的护佑神力不断地进行褒封。事实上,如若没有朝廷对妈祖信仰的提倡与支持,作为民间信仰的妈祖信仰便很难在全国的范围内产生较大的影响。正是朝廷将

①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教化性权力”似乎更加符合中国本土的事实。

② 《三教搜神源流大全·天妃娘娘》,清宣统元年刻本

上述传说中的妈祖事迹很显然十分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兄妹之间的道德关系理应按照“兄友弟恭”的原则得以理解与体现。作为官方宗教的妈祖信仰在统治者眼里是一个宣扬儒家道德规范的理想载体之一。换句话说,在统治者那里,信仰不再是宗教领域中的事情,而是要为政治领域服务。“神道设教”四个字中,“神道”是手段,而“设教”才是最终目的。当然,要想实现“设教”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手段,如清代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就是这样的手段之一,此外在地方上建书院、设义学等都可以作为“设教”的手段予以推广与颁行。但是在众多“设教”的手段之中,利用“神道”似乎是一种相当具有远见卓识的做法,体现出了统治者的良苦用心。

在中国古代那个普遍相信神灵存在的社会中,利用“神道设教”似乎比“人道设教”更有效。在中国文化中,尽管许多神灵都是由现实的人转变的,如关羽和妈祖。但是当人转变为神的时候,他就具有了使人产生敬畏的宗教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才能够保证在“设教”的过程中对广大民众发挥最大与最有效的影响。其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懂得这个道理。或者说这个道理在历代统治者中是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他的统治能够一直平稳地延续下去。因此,统治者往往十分希望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并且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显然,“设教”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一个新朝代的建立要想使人心服口服,不能仅仅依靠武力的征服,而是必须致力于思想的统一。而这个工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便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心照不宣的事实。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统治者,他必须要考虑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要通过意识形态、制度、政策等形式维持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这也就是政治逻辑。自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对妈祖进行褒封与推崇,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便是政治逻辑的体现。

### 三、有求必应:

#### 妈祖信仰中的生活逻辑之一

如果说“神道设教”的行为体现了朝廷的政治逻辑,那么天津天后宫的建立则或多或少体现出官方的生活逻辑。据说妈祖第一次得到官方的认可

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那一年朝廷为一座妈祖庙“赐庙额曰顺济”。原因是朝廷派使者出使高丽,途中遭遇海难,幸运的是得到了妈祖的护佑,得以顺利返回。朝廷为了答谢妈祖的神力护佑,才正式承认妈祖信仰。在随后的多次褒封与建庙中,大多是出于重大的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考虑的结果。而天津天后宫的建立则与元代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有关。天津的天后宫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从明清时期直至民国年间有过多重重修与重建的经历。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朝廷派遣官员致祭全国的妈祖庙。当年祭直沽庙(天津天后宫)的祭文如下:

国家以漕运为重事,海滨以神力为司命。  
今岁两运,咸藉匡扶,江海无风涛之虞,朝野有盈宁之庆,帝用钦嘉,谨遣使者奉香,仰答灵贶,惟亿万年,神永保之。<sup>①</sup>

从官方对妈祖的祭文中可以看出妈祖的护佑神力对于国家重大经济事件的意义。在这里,官方祈求妈祖保佑漕运的行为与船民祈求平安的行为似乎没有本质区别。尽管对于官方来说,能够得到神灵保佑的象征意义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官方同样需要妈祖的“灵验”。在关于妈祖的众多传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官方密切相关的。流行于清朝的关于妈祖题材的绘画作品《天后圣母圣迹图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涉及妈祖对于官方的护佑。从该书的目次来看,有护运漕粮的,如“垂神灯粮船有赖”、“波涛中默佑漕船”、“佑漕船利运天津”;有助战克敌的,如“助阴兵金人碎首”、“赖神功澎湖破贼”、“解军渴涸井流泉”、“率神将周寇亡身”;有护佑使者交往的,如“闻鼓吹郑和免险”、“赴琉球阴护册使”。对于官方来说,妈祖信仰必须与国家的重大战争、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才能够获得合法的空间得以传播。只要妈祖对于国家的重大事件“显灵”,那么官方就要隆重地酬谢妈祖的神力。可以说,官方对于妈祖的崇拜既体现了政治逻辑,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生活逻辑。

如果把关于妈祖的传说按照内容分类的话,那么在有关妈祖的众多传说中,其中有一类是与商人有关的。在上文关于妈祖救兄的传说中,除了强调妈祖与亲人之间如何相亲相爱之外,她的四位兄长的职业是值得注意的。妈祖救兄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她对亲人的爱,同时她也是以商人的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在传说中的。

① (清)杨浚纂辑:《涓洲屿志略》卷一,温陵杨浚冠悔堂,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在另一部道教经典中,妈祖则被认为是太上老君委派“妙行玉女”降生人间拯救民间大众疾苦的化身。在妈祖与太上老君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往来于海上贸易的商人团体仍是她保护的对象:

自今以后,若有行商坐贾,买卖求财……但能起恭敬心,称吾名者。我即应时孚感。令得所愿遂心,所谋如意。<sup>[2]</sup>

直到清代的《天后圣母圣迹图志》中也有一幅图名为“草化木垂救商船”。<sup>①</sup>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妈祖作为商人,尤其是往来于海上的商人的保护神形象一直延续下来。在关于妈祖的传说中,她的基本的神格是海神,能够保护与拯救发生海难的人们们的生命安全。而元明清时期的海上贸易有所发展,在海上往来的船只中,除了官船和渔船外,有相当数量的船属于商船。尽管当时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有很大的提高,但是面对变化无常的天气与充满危险的大海,实现海上远航依然是件困难的事情。元代诗人臧梦麟的《直沽谣》道出了航海的危险与艰辛:

杂遘东入海,归来几人在。纷纷道路觅亨衢,笑我蓬门绝冠盖。虎不食堂上肉,狼不惊里中妇。出门不险阻,何况茫茫海如许。去年吴人赴燕冀,北风吹人浪如砥。一时输粟得官归,杀马椎牛宴闾里。今年吴儿求高迁,复祷天妃上海船。北风吹儿堕黑水,始知溟渤皆墓田。劝君陆行莫忘莱州道,水行莫忘沙门岛。豺狼当路蛟龙争,宁论他人致身卑。君不见,贾胡剖腹藏明珠,后来无人鉴覆车。明年五月南风起,犹有行人问直沽。<sup>[3]</sup>

诗中所描述的虽然是官船,但可以推测商船远航依然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得到海神妈祖的护佑无疑成为商人们和船员们的精神需要与寄托。在海上航行的商人团体中,妈祖的护佑意味着人员与货物的安全,意味着能够克服各种危险与困难,最终获得平安与顺利。

由于妈祖信仰最初产生于东南沿海一带,因此这一区域的商人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妈祖虔诚的信仰者。而正是通过海上贸易与运输的途径(也包括河上贸易运输),妈祖信仰得以不断向北方传播。其传播的途径与运输或贸易的路线具有高度相关性。由于南方商人在货运的终点站会逗留一段时间,也因为他们的下船后要酬谢妈祖的护佑,因此祭祀妈祖的行为便在货运的交通枢纽处建立起来。

这就为南方商人将此信仰传入北方的局面打开了大门。以天津的闽粤会馆为例,闽粤会馆建立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初。清初朝廷提倡海运,闽粤两省的商人来津贸易者大量增加。闽粤商船每年春季结队北上,于农历惊蛰节后抵津,停泊在针市街后的运河码头,针市街也就成了南方商人的聚集地。建造会馆的目的除了供来往商人临时住宿、贮存货物外,还因为南方商人抵津后,先要举行隆重的酬神仪式,答谢“天后圣母”保护商船海上的安全,即所谓“虔祀天后,报答神庥”,因此闽粤会馆都要供奉“天后圣母”神位以备奉祀。<sup>[4]</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是天后宫中的娘娘信仰的主体。尽管天后娘娘受到过朝廷的众多褒封,但对于前来天后宫烧香的大部分妇女来说,求子与保平安才是她们所最为关心的事情。清人杨无怪在《皇会论》中称:“只听得锣鼓声喧喧,又见那儿童欢喜,妇女争妍……有那女眷,拈香拜街前,一种情思无两般,无非是求子育男”。<sup>[4]</sup>这种对于求子的欲求似乎是传统社会大部分妇女的生活愿望之一。在妈祖从单一神向全能神转化的过程中,关于妈祖传说中的主司孕育的职能则被不断强化。在天津的天后宫,天后娘娘简直成为妇女专门祭拜的最高女神。

在20世纪初期举办的皇会中,妇女无疑成为最主要的敬香者,男子通常情况下是不能与妇女一同祭拜的。例如1928年2月15日《北洋画报》中《娘娘宫》一文载:“此庙正门及殿上,贴有‘男子不得入此门’及‘此处不准男子逗留’之黄纸布告”。<sup>[5]</sup>可见,女子似乎被置于比男子更为优待的位置上。

天后宫中供奉的除了天后娘娘之外,还供奉了眼光娘娘、子孙娘娘、耳光娘娘、斑疹娘娘、千子娘娘、引母娘娘、乳母娘娘、百子娘娘、催生娘娘、送生娘娘等。从每一位娘娘的不同名号可以看出每一位娘娘都具有专门的职能。神灵职能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的生活环境。特定神灵的特定职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特定信仰者群体的心理需要。因此可以说,要么某个神灵被赋予多样化的职能,要么特定的人群便会在漫长的时间里塑造出若干满足自己社会需要的神灵。天后宫中的娘娘们的每一项职能都与生养孩子有关。而生养孩子无疑又是传统社会中妇女的主要生活内容之一。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再到出生后的健康与否,都是家庭

①(清)寿恩堂辑:《天后圣母圣迹图志》,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中的妇女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面对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会遇到风险，在这之中尤其有两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否能够生育和孩子的健康问题。这两个重大的问题困扰着不同的妇女。所以来天后宫拜娘娘的妇女的愿望大多是求子、祛疾与求平安。

在求子方面，最具特色的便是“拴娃娃”的行为。这一信仰实践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求子行为中也能看到。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一习俗与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有关。<sup>[6]</sup><sup>187</sup> 不管如何，能够拴走或偷走一个泥娃娃对于妇女们来说是得到了天后娘娘的恩赐。日后若果真生下孩子，一定要回来还愿，重重地酬谢娘娘的恩赐与保佑。而那些已经身为人母的妇女，则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一同跪拜在天后娘娘的脚下，祈求能够祛除孩子的所有疾病并且能够健康成长。在一首作于1921年的描述天津过年时的歌谣中这样写到：

大街上，行人减，好不凄惨，把一个繁华世界，变作了逃反后的庚子年。云淡风轻近午天，残妆妇女街头见，花花朵朵，接二连三，非等闲，天后宫去还愿。一来为儿女，二则求平安。开庙门，头一天，摆摊的，列两边，耍货玩物十样大全。打锣打鼓人声乱，往后去又看洋片。庙里面人山人海，烧香妇女走中间，男子两旁站，如同站班，不得看。往里钻，巡警出力将人赶。只许老道周旋其间，这算是香火因缘。<sup>[7]</sup>

在祭拜天后娘娘的妇女中，有一类特殊的人群也是妈祖的虔诚信徒。这类人群便是妓女。在一部1931年出版的介绍天后宫的文献中曾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旧历元旦，各娼妓祷祝于此，粉红黛绿，满院光辉。<sup>[8]</sup>

当时离天津老城不远的侯家后一带曾经是津门著名的娱乐场所所在地。而各种各样的妓院大多设置于此。尤其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侯家后的妓女们一般都会全身穿上红色，在保镖或者嫖客的陪同下来到天后宫跪拜在天后娘娘的脚下拜祭。对于她们来说，天后娘娘的神力也许能够保佑她们生活能够多一些平坦与平安。

#### 四、有意利用：

##### 妈祖信仰中的生活逻辑之二

当妈祖信仰出入北方后，那些不需要依靠海上贸易的当地商人又是如何看待妈祖信仰的呢？信

仰源于信仰者的需要，当信仰者的需要变化或消失时，那么信仰是否会同时产生变化或亦随之一同消失呢？接下来我们以清末民初的天津地方商人为考察对象，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并利用妈祖信仰的。

从事于海上贸易的南方商人对妈祖虔诚的信仰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也来源于生意中产生的困难与问题。然而，南方商人遇到的海上运输问题对于天津本地的商铺商人则根本不成为困难。天津商人不需要远航，不需要同大海打交道。因此，他们就不需要海神的保佑。妈祖的海神职能不适合天津商人的实际需要。然而事情总是复杂的，复杂到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事实上，妈祖并没有因为不合天津商人的需要而消失，相反，她在天津扎下了根。尽管她作为南方商人与船员的海神依然保佑着其虔诚的信仰者，与此同时，她的其他职能使她成为全职全能的女神。需要说明的是，她的这种万能之神的形象并不是传入天津后才出现的。早在明代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中，妈祖就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职能：

一者誓救舟船，达到彼岸；二者誓护客商，咸令安乐；三者祛逐邪祟，永得消除；四者荡灾屯，家门清静；五者搜捕奸盗，屏迹潜形；六者收斩恶人，诛锄强梗；七者救民护国，民称太平；八者释罪解愆，离诸报对；九者扶持产难，母子安全；十者庇护良民，免遭横逆；十一者卫护法办，风雨顺时；十二者凡有归向，保佑安宁；十三者修学至人，功行果满；十四者求官进职，爵禄享通；十五者过去超生，九幽息对。

以上妈祖的每一项职能都折射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需要。当她的某一项职能不能满足某一群体的需要时，她的其它职能还是能够成为其他人群的心理慰藉。正是由于此一原因，妈祖信仰在天津不会因为不合天津商人的需要而衰落。相反，她反而能够满足其他群体的需要而生存下来，并且与当地的信仰与民俗融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从而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

由于文献的限制，我们无法知道天津商人是否像南方商人一样信奉妈祖的灵验。但是我们接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天津商人对于妈祖的依赖与利用。前文说过，正是由于妈祖的多样化职能，使得她能够成为地方上具有号召力的神灵之一。天津天后宫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或三月腊月等节庆的日子，妈祖神像周围总是香雾缭绕，香火极盛。由于妈祖声名远播，特别是每逢“皇会”（一种迎神赛会）

举办的时候,天津周围的村夫村妇也都赶来拜“娘娘”。庙会由此形成极大的人流,而与此相配合的是物流的提升。众多的人流意味着商机,因此天后宫前的宫南宫北大街成为天津早期的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而这条商业街上的铺户的生意则与天后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铺户商人们是否像闽粤会馆的商人信奉妈祖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意与天后宫的联系则非常自觉。他们知道自己与天后宫尤其是与“天后娘娘”唇齿相依。他们知道妈祖的影响力对于他们生意的紧密关系。

二者的这种依附关系终于在宣统二年(1910年)得到了戏剧性的展现。当时,有人在议事会呈递说贴,希望当局仿效查禁三太爷庙之事,将天后宫关闭。说贴呈递后,天后宫南北全街的鸿升斋等195家商铺联名于正月二十八日(3月9日)致函天津商务总会,恳请当局保护商业,不要关闭其赖以生存的天后宫。文称:

窃近闻有人在议事会呈递说贴,严禁天后宫一事。然天后宫于(与)三太爷庙不能一般比例,而天后宫正在街市,历有年所,逐日进香之人往来街衢,关于商等不无小补;及正三五月大会之期,闻津商工广开销路,无不利益。是此宫南北全街铺户依为屏障,否则货物滞塞,何堪设想。为此恳请:商务总会诸位宪台电鉴,设法保护商业,维持天后宫,不但津商之幸,即四方工艺亦沾惠矣。上禀。<sup>[6]</sup>

事情的结局自然是圆满的,天后宫最终得到商人们的保护,免除了遭到关闭的命运。在这件事情中,商人们似乎成为了妈祖的保护者。

如果认为天后宫的妈祖仅仅与宫前商业街的商铺命运休戚相关的话,那么就会轻视妈祖影响力。事实上,天津的天后宫在当地扮演了宗教信仰中心的角色。这一中心甚至辐射到了周围几百里的范围。每到重大节庆的时节,前来参与的人群并不仅仅限于当地百姓。天后宫形成的庙会既是作为宗教中心,也是作为商业中心而存在的。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宗教的发展,宗教所集聚的人流又促进了商业的兴旺。在庙会中,很难把宗教与商业纯粹地分离开来。而天后宫中神殿与商铺并立的现象似乎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惊讶与不安。在人们的心里,神灵已经生活化了,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神灵仍然具有庄严的神性与不可侵犯性,但是神灵与他们的距离似乎并不远,也许是人们有意拉近他们与神灵的距离,这从天后宫中

所立的其他神灵便可以看出。

作为商业中心,妈祖的影响力便与其所辐射的地方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作为商人,不仅仅只有宫南宫北大街的铺户们自觉地明白自己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后娘娘的香火是否旺盛,地方上的商业精英对此具有更深刻的了解。如果说宫南宫北大街的铺户商人们仅仅是被动地依靠着天后娘娘的话,那么地方上的商业精英们则知道如何主动地利用妈祖的影响力达到繁荣商业的目的。

成立于1903年的天津商务总会是一个代表地方商业精英利益的机构。在20世纪举办的仅有的五次“皇会”中,由它参与并发起的就占了四次(1907、1915、1924、1936)。仅以1936年举办的“皇会”为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侵入,天津的地方商业精英的利益受到很大威胁,导致百业凋敝,市面萧条。于是他们联名向地方政府请求重新利用举办“皇会”的机会振兴地方经济。商业精英们的申请最终得到了批准,皇会如期举办。当时有评论者认为皇会的举办至少表面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sup>[9]</sup>另一方面,考察每次皇会的出会路线会发现,历年的出会路线基本上是相同的,尤其是天后娘娘出巡散福的路线基本上都是经过当时商业最为繁华的街道。比如1936年的出巡散福经过了大胡同、估衣街、针市街、北马路、东马路等主要街道。<sup>[9]</sup>在上述个案中,似乎很难发现地方商业精英除了利用妈祖信仰之外,还有多少是虔诚的信奉。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恰恰是由于商业精英的积极参与和争取,皇会才得以举办,天后娘娘才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祭拜,妈祖信仰才不会被人们遗忘并能够一直延续下来。

## 五、结语

本文以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两个概念重新考察以天津天后宫为中心的妈祖信仰及其相关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政治逻辑的时候,并不是要对历代统治者的阴谋诡计做揭露与批判,而是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试图说明人类群体生活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逻辑。人类以群体的形式组织生活在一起,其中群体的类型、规模、特点等都有相当的差异。而在人类形态各异的群体生活中,便存在着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当群体规模愈来愈大,人际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复杂的时候,便会面临如何使大群能够运行发展下去的问题,而政治逻辑即是处理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因此,政治逻辑无所谓好与不好,它只是处理复杂群体关系的一种思路。事

实上,如果不从社会整群的角度思考与处理社会秩序的问题,人类群体便很难生存下去。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便有很大一部分学者都致力于探讨与回答像社会秩序这样的关乎人类群体发展的宏大问题。

相对于政治逻辑来说,生活逻辑所涵盖的人群范围要广泛得多。对于人类群体中的大多数来说,政治逻辑离日常生活很遥远,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似乎来得更现实与更稳妥一点。大多数人都是“胸无大志”的,他们没有也不需要“为万世开太平”的决心。因为生活逻辑处理的就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它是微观的、琐细的、实际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按照生活逻辑度过每一天。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农夫愚妇,总要过日子。过日子是不需要政治逻辑的。

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区分是为了说明存在于两种不同场域中的思路。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有时同一种行为在不同的场域中就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逻辑来。比如孝敬父母这种观念与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生活逻辑的体现,而把孝敬父母这样的价值观通过制度的形式推广到全社会便是政治逻辑的体现。因此,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提出可以看作一种观察视角或观察方法。在二者之下都含有丰富的内容。“神道设教”只是体现政治逻辑中的一种行为,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为或者制度

反映了政治逻辑,那需要获得新的材料的支持。同样,祈求灵验与利用神祇也只是生活逻辑中的两种表现形式。

## [参 考 文 献]

- [1] (美)詹姆斯·沃森. 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M]// (美)韦思谛编,陈仲丹译. 中国大众宗教.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57—92.
- [2] 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M]// 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 [3] (元)臧梦麟. 直沽谣[M]// 罗春荣. 妈祖文化研究.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 [4] 刘海岩. 空间与社会[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 [5] 董季群. 天后宫写真[M].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133.
- [6] 罗春荣. 妈祖文化研究[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 [7] 李琴湘. 天津过年歌[EB/OL]. [2012—12—10] <http://dlibrary.tj.tj.cn/dfzqw/tjgng.htm>.
- [8] 宋蕴璞编辑. 天津志略[M]. 河北大兴蕴兴商行,1931.
- [9] 望云居士. 天津皇会考纪[DB].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责任编辑:闫卫平)

## Two Logics of Worship of Mazoo in Tianjin City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un Yue

(College of Humanity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650500)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pular worship of Mazoo in Tianjin District from Q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 China based on the frame of living logic and political logic. And the political logic is primarily reflected in dominator's respect for god while living logic is embodied in people's expectation on Mazoo's almigh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these two logics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specting perspective or approach, which i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a particular worship of god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performing logic of belief behind.

**Key words:** Worship of Mazoo; Political Logic; Living Logic; Have Respect for God; Almighty

